

中国聚焦 | 陈企业 聂彤昕 自信爱

北京成为宜居城市：长路漫漫

在中国，每年有约2000万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开始越来越担忧城市宜居程度的现状。在使用全球宜居指数排名作为参考时，我们需要注意这些指数对城市普通居民的适用程度。试问，那些主要用于帮助跨国公司决定其驻外人员的报酬和辛劳津贴的指数，比如经济学人信息部（EIU）的经济学人信息部宜居指数，和美世生活质量调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地居民的视角和意见？2015年，经济学人信息部宜居指数将北京排为中国八大城市中最宜居的城市（尽管在该排名中，北京在全球140个城市中位列第69名），微博上对此出现了一大片嘘声。

其中最明显的批判，是关于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北京空气质量之糟糕，相当于一天吸40包香烟。经济学人信息部宜居指数很可能在其宜居指数中忽视了环境因素对宜居性的影响：在其指数中，经济学人信息部宜居指数将环境因素定义为人类生存的普通环境，而不考虑空气质量、水质等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层面。此外，经济学人信息部宜居指数中有一整个小类，是用于评估体育娱乐设施的普及程度的。有网友指出，尽管北京有齐全的文体设施，但如果空气质量差到难以让人在户外运动的程度，这些设施又怎么能够被人利用？当

然，经济学人信息部宜居指数起初是针对西方驻外人员群体的，其目的是警示地区决策者不要盲目参照指数。这也说明了在制定政策提高城市宜居性时，因地制宜考虑当地问题的重要性。

就中国城市的宜居性而言，户口制度、交通拥堵等问题，对实际生活质量和宜居程度有很大影响，因而需要密切关注。近日，北京在交通拥堵方面位列中国45个主要城市之首；在高峰期，北京人均花费在堵车上的时间达每小时32分钟。在户口方面，尽管北京实际居住人口已达总人口的55%，许多人，尤其是外来务工者，没有正式户口而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工作机会和社保服务等福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对此无所作为——事实上，2014年3月，政府发布了北京户口新政策；在2015年11月的十三五规划中，政府又再次强调了其重要性。总而言之，在评估地方的宜居性标准时，必须体现具有当地地方性的因素并密切关注其相关发展。中国政府宣称，将引导城镇化向以人为本、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因此评估时也更应注重这一点。

在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CI）的大中华100个城市宜居性分析中，北京位列第44名，而其他一线城市，如上海（第31名）、深圳（第35名）、广州（第67名），也

都不在最宜居城市之列。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通过收集来自基层普通居民的看法，采用了综合全面的宜居性分析框架，即中国特色的全球宜居城市指数进行分析。通过在100个中国城市进行随机电话调查，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获得三万个来自大众的有效回复以作为研究数据。与经济学人信息部所采用的方法不同的是，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用一整个分类来衡量环境因素对宜居性的影响，并将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具体要素都包括在内。此外，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还调整并采用了那些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因素，如食品安全以及噪音污染等。

和那些角度单一的宜居性指数相比，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的研究因采用中国当地居民民意，而更具有地方相关性和适用性。基于中国大量的流动人口和飞速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宜居性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流动人口，更是举国百姓。因此中国政府更应全面正视城市宜居性，不应急于求成。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政府应辩证地使用全球宜居性报告作为参考，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惠及人民，为普通人民创造出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陈企业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聂彤昕和自信爱是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副研究员**